

■ 学者导读

区域社会研究的新成果

——《百越：公元前10至前3世纪东南沿海的文化与社会》序

徐天进

中国东南沿海是东北—西南高地之外的另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主要分布着古夷、越的文化，这里既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特质，又与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理解“何以中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该区域的系统性考古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在吴桐博士入学之初，我即建议他可否以此作为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方向。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并着手搜集、整理相关文献，两年后撰写了《试论中国东部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9年）。在这一过程中，吴桐发现以长江为界，东部沿海不同地区的文化、社会特质及其融入中华一体的先后次序、方式都呈现出明显的南北之别，同时也是出于研究内容和工作量的考虑，决定将研究范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适当缩小，具体确定为“公元前10至前3世纪东南沿海地区的文化与社会”。

公元前10至前3世纪的东南沿海地区大体相当于“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的百越之地。该地区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长期的考古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该地区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考古工作开展差异性，相关研究只能局限于区域性、专题性的讨论，而难以开展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分析。吴桐若要完成他的研究任务首先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材料，二是方法。

熟悉并穷尽材料是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他一方面需要大量阅读、全面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熟悉并了解已有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需要对该地区的田野考古及遗址和遗物有亲身的感受并获得实践的经验。为此我特别安排他参加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在湖州昆山遗址的发掘，并实地踏查了苏南、浙江、闽北、粤中等地区的重要遗址，观摩了大量出土文物的标本。这些工作为他此后的研究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鉴于所研究区域考古材料的特殊性和所设定的学术目标，除了充分运用传统的考古学方法之外，他还需要尽可能借用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为此，吴桐专门随陈建立教授系统学习了定量统计方法，并将其运用于浙北平原中小型土墩墓的等级划分（《古代文明》第15卷；《宁绍平原两周时期陶器生产标准化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21年第1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至对东南沿海墓葬等级架构与经济生产生活的系统讨论。论文于2021年通过答辩，并得到了答辩委员们的一致好评。毕业之后，吴桐根据答辩委员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又对论文做了认真修改，并补充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现在呈现给各位读者的就是这篇论文的终稿。

中国考古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基本完成建构年代框架和文化谱系的任务，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学科目标而言，“透物见人”再次被提上议程。超越“陶器层面—文化格局”的研究范式，深入讨论社会历史层面的诸多问题正成为目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趋势。吴桐的研究



即是在此大背景下的一次实践。他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在比较系统、完整地构建东南沿海地区统一且细致的文化分期与年代框架的基础上，重点对墓葬与政治、陶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讨论。从墓葬的等级划分、随葬品器用、墓室营建、墓地布局等方面考察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通过对不同区域陶瓷制品的产地、年代、特征、流通等问题的综合分析，考察了包括生产规范化程度、专业化水平及消费选择趋向等在内的区域经济活动内容，并对公元前10至前3世纪东南沿海的社会与文化提出了自己整体性的认识。

该书提出了不少颇具新意的观点，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东南沿海地区社会发展模式与转型态势的概括。对格局、等级、经济等方面的研究表明：以春秋晚期为界，其前后的变化是，社会发展水平由低到高，发展速度由缓到疾，发展动力由内部到外部，等级结构由“秩序”转向“制度”，经济生活由迟缓转向突变并逐渐服务于政治需求，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由“经济观”转为“政治观”，社会发展模式由“经济模式”转变为“政治模式”，在外来文明的刺激下实现“政治化”转型。其中太湖杭州湾与岭南的社会发展具有鲜明的共性内核与差序格局，分别表现为主动、全面的政治化与被动、局限的政治化。这种“经济模式”，根源于地区本身的资源禀赋结构，可以作为春秋晚期之前，东南沿海地区主要考古材料的基础解释框架。

鉴于东南沿海地区考古材料的局限（零散且不均衡），文献材料亦不甚丰富的客观条件，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尚难取得一致性的认识。本书对该地区社会发展模式的概括当然不是唯一的正解，但书中对文化、格局、等级、经济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的系统梳理，或许可为今后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资追溯的线索，有些观点对宏观把握作为边疆的百越地区的社会特质及其华夏化进程，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一系列的新发现不仅填补了部分时间和空间上的文化空白，也增添了许多新认识。新发现方面，衢州庙山尖、孟姜村贵族（有学者认为是姑蔑）墓葬的发掘，再次凸显了浙南闽北地区的重要历史地位，吴桐将其与此前发掘的电溪爿墓、瓯海杨府山、黄岩小人尖、浦城管九等墓葬材料相联系，重新对西

周时期中原与江南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浙南闽北地区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区域中心，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突出表现为以青铜器、原始瓷等为主要内容的流通，浙南闽北铜器墓的突然集中出现应是经济原因导致的。此前罗汝鹏、黎海超曾分别通过原始瓷、印纹硬陶的流通深入探讨过夏、商时期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问题（《从“象鼻盂”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论夏商时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贡赋模式》，《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金道窑行——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吴桐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先秦时期百越地区的文化及社会交流网络，并为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资源流通关系提出了一种新解释。

这些新发现中更加重要的是聚落考古方面的突破性进展。此前东南沿海地区遗址（居址）的发现和发掘相对较少，作为考古研究重要议题之一的聚落形态研究明显薄弱。随着浙江湖州安吉古城、绍兴大湖头遗址、亭山遗址群、衢州石角山古城、丽水云和遗址群、福建富屯溪流域遗址群、光泽何家潭遗址，广东广州黄埔遗址、火村遗址等一系列调查、发掘工作的持续开展，聚落形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成为可能，此外还有越国水利系统的新发现……这些发现是未来百越考古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对于深入探讨百越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问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对生业经济的关注也成为近年来新的研究热点之一。宁波大榭岛盐业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东南沿海地区冶金考古相关的系列成果，进一步拓展了“资源与社会”关系的探讨空间。百越地区的考古研究，正迈入一个新阶段。

区域社会研究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加之考古发现和材料的天然局限，要实现“透物见人、见社会”的学术目标，绝非易事。吴桐对东南沿海地区文化与社会探讨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该书虽然在基础材料、研究方法及理论依据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补充、完善乃至修正之处，但我相信，他所提出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路径和观点，不仅对该区域的考古学研究有所启示，对今后其他区域类似问题的讨论也当具有借鉴意义。

吴桐博士毕业前夕，我曾书赠他“不敢怠荒”四个字，转眼已经过去四年，他也从一个考古专业的学生成长为一位考古专业的教师。这段时间我们时常见面，知道他平常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能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照顾家庭之余坚持读书和写作，不曾稍有懈怠，难能可贵。希望他今后对学术研究能够一直抱有初始时的热情和纯粹，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本文为《百越：公元前10至前3世纪东南沿海的文化与社会》序，发表时有删节）

《百越：公元前10至前3世纪东南沿海的文化与社会》
作者：吴桐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8月

砚，又称砚台。它作为中国传统文房用具之一，是用来研墨的器具。它融雕刻、文字、历史、书法、绘画等艺术形式于一体，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传统工艺品。从宋到清，历代文人学者多对其进行著录，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华砚文化。几十年来，各地文博系统陆续出版了不少馆（院）藏砚类图录，其中最新者，当属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编的《百砚千姿：古砚研究专辑》（下文简称《百砚千姿》）。纵观全书，其重要特点是集中体现了晚清以来北京地区二百年来文人藏砚之趋势。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本身，是北京市文物公司。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历尽艰辛，第一时间把握北京古玩市场的收藏动向，通过多种途径抢救了大量文物，在文物研究和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本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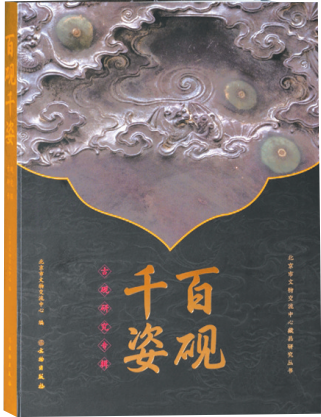
特点一：书中所录文人藏砚，有着明显的品牌效应。其表现有二：一是人们对于端砚的追捧；二是人们对于制砚名家作品的青睐。关于前者，涉及清代各种石材的大量涌现。清代藏砚爱好者关注的重点，在于砚石的质与色。书中所录砚台的石材丰富多样，一般具有石质优、发墨好、雕琢精致、耐人品鉴的特点。据统计，本书收录的砚台一共有133方，除唐宋“四大名砚”端、歙、洮河、澄泥以外，其他佳砚品种也有不少，如砖瓦砚、玉石砚、漆砂砚、松花石砚、菊花石砚、青金石砚、腰卵石砚、黄石砚、祁阳石砚等。其中端砚的数量占据六成以上。端砚，因其材产于广东肇庆之端溪而得名。其石料花纹的品种较为丰富，砚材的色泽也很有讲究。清代广东砚雕艺术巧妙地把艺术和实用性结合在一起，在造型、构图、题材、立意上有新的突破，从而开辟了端砚新的艺术意境。关于后者，人们普遍关注历史上顾二娘、陈端友、卢葵生等制砚名家的品牌效应。如书中录有“端友制”的洮河石雕蘑菇随形砚。而卢葵生漆砂砚、嵌螺钿盒漆砂砚、百宝嵌盒漆砂砚等，印文皆有“葵生”字样。又有澄泥菌子砚、凤流云砚、端石云月砚等有“吴门顾二娘造”等印文。

特点二：《百砚千姿》一书专设“名人铭刻”一节，收录砚台84方。书中文人之砚，按铭文主题析之，可分为书案友、收藏趣、君子交、祈吉祥等，体现了清代至民国文人的书房意趣。古砚的文化内涵，因历代名人的鉴赏、使用、收藏、题咏而不断丰富。随着赏砚、藏砚、刻砚之风日益盛行，历代制砚者及藏砚者于砚田之上镌石作书、寄托情怀，谓之“砚铭”。内容既有刻砚者、赠砚者、砚主人、收藏者和鉴赏者及其彼此关系的记载，也有关于砚的产地、制作年月、流经经过和人物事迹等的描写。古代科举制度，将文房四宝与文人绑定在一起，使之成为朝夕相处的朋友。纵观文人为砚所作铭文，更多的是收藏者、鉴赏者和砚主人对砚的评论与鉴赏，赋予端砚更多的人文底蕴。如端石紫鸾砚：“为艺苑之良朋，亦戎之益友。”姚元之的端石桐月长方砚：“石友石友。端方浑厚。”端石箕形砚：“文房佳友，翰墨因缘。”砚台遂从文房友，发展成为文人趣：中国古砚的收藏历代传承，从其诞生开始，便与文人雅士结下了不解之缘。清代端砚的造型和装饰与其他工艺品类一样，普遍含有吉祥的内容。这类装饰图案，大部分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如端石岁寒三友砚、端石竹节砚、端石梅桩砚、端石雕梅花随形砚等，大量运用松竹梅元素，以展示古人追求最高人生价值的愿望。而端石长方福禄寿砚、歙石雕一团和气圆砚等，证明文人们愿意通过砚台上的图案，来祈求福、禄、寿等的到来，进而表达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著录砚仅提供全部砚上信息，而不注明年代。此举可为砚台爱好者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平台，自行判断年代与真伪，有利于百家争鸣。之所以如此，应与20世纪的藏砚活动深受《西清砚谱》影响有关。按照清人观念、陶质砚（其中又分为陶质瓦砚、砖砚及澄泥砚三类）先于石质砚存在：“古砚流传，大约陶石二种为夥……先陶于石……从其朔也。”砖瓦砚绝大多数是由汉魏建筑上残留的砖瓦改制而成的。因其质地坚实细润，发墨不损笔，而深受文人学士喜爱。最为著名的，便是《西清砚谱》中将未央、铜雀台之瓦及汉砖改制之砚作为汉砚置于篇首。然而从目前的考古出土材料来看，战国至西汉的砚台多以杂石制作，形态以饼圆形为主。至东汉，石砚上开始有雕刻纹饰。魏晋时，北方盛行方形四足石砚，江南地区则大量出现青瓷砚。后者多圆形，其砚足呈现由三足至多足的发展趋势。由此可知，从考古学意义上讲，在隋唐之前，所谓秦汉砖瓦砚并不存在，它只能是后世一些好事文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再加工的特殊喜好。故清人所作“先陶于石”之论，导致了将它器当成汉器的失误。今天，人们虽然通过出土古砚清楚地看到了汉砚的面貌和特点，但一些传统的影响，以及某些收藏家的错误论点，仍不时地在砚学研究中产生着干扰作用。因此，用出土汉砚作为鉴定秦汉砖瓦砚之标准，对于明辨这种陶砚的真伪是大有裨益的。此外，本书还设“皇家御制”一节，收录11方松花石砚、歙石砚、端石砚等。其模仿主体，是自乾隆中期之后，以“玉兔朝元砚”为名的一份六方的御制砚：即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仿汉石

晚清至民国北京地区文人藏砚大观

林欢

——《百砚千姿：古砚研究专辑》导读



渠阁瓦砚、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德寿殿犀文砚、仿宋天成风字砚。另外还有仿唐观象砚、仿宣和虎符砚以及海天浴日砚等，皆源自《西清砚谱》所述经典砚式。

特点三：书中收录了四篇研究论文，分别涉及砚石开采、经典砚式、砚史梗概、传统文化等方面。其文化深度层层递进，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砚史概况与发展方向。

砚石的开采，不仅劳动强度大，且有生命危险。加之砚石的稀缺，导致历代官府多对名坑实施垄断。书中有多方端砚铭文涉及端石开采的史实。故这些端砚铭文遥相呼应，更具补史意义。如郝佳雯《邱启寿及其藏砚》一文，以书中两方邱启寿藏砚为引，考证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张之洞开采砚石的工程，并就“砚务官”邱启寿在“张坑”开采中的个人贡献进行了阐述。“砚务官”一职，源自南唐李后主委任砚工李少微之典，张之洞因袭之。不仅如此，书中还有端石雕牛长方砚、端石随形砚等铭文，提及嘉庆初年，即丙辰（元年，1796年）到癸亥（八年，1803年），当地以肇庆知府广玉为首的，长达八年的开采“西洞老坑”的过程。由此可知，文人官僚对端砚的趋之若鹜态度贯穿清代始终。清代端石开采史，就是清代士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砚又称砚田，古人托物言志，以笔代耕，以砚为田，以抄写或绘画为生，故取“笔作耕牛砚作田”之意。田辰《浅谈井田砚》从中国典型砚式——井田砚的历史进行考证，并对其特点、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等进行了总结。至于古砚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和艺术特点，李宇翔通过《略论历代古砚的艺术风格、制作概况以及发展前景》一文加以简要阐述。此文不仅提出历代古砚的几大艺术特点，还对当前制砚产业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中国传统艺术追求的境界便是一种阴阳相生、对立统一的和谐之美。清代盛行随形砚。随形砚是指根据砚石的天然形态巧加设计而成的砚台。如端石猫形砚、菊花石圆池砚等，巧用石眼、石斑，对石块的外表不加刻意修整，顺其自然，因石构图，使之情趣盎然。郝佳雯《浅谈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制砚中的体现》一文指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砚台中的反映，进而提出制砚美学中蕴藏的“器而不饰”“器以载道”“制器尚象”“因材施艺”“阴阳相生”五种传统艺术精神。

千百年间，历代能工巧匠与藏砚名家在制砚的实践中，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在了一方方珍贵的砚台之中，使之成为可用、可品、可藏、可诵的中华文化载体。然而仍有不少学术障碍尚未克服。一是在清代士人文化研究领域，包括砚台在内的文具，与诗歌、笔记、书画、信札等媒介，同级并列的文献资料，尚未引起多数人的关注。二是目前对明清传世砚台的研究，虽已涉及对铭文的详尽解读，但是对于明清砚台的形制演变、制作工艺、文化属性等多个方面较少涉及。与此同时，考古出土的明清砚台资料相对较少，且不能仅仅依靠考古学研究范畴中的类型学分析，即：在对器物的形制、装饰等特征的描述基础上，进行分型并做文化性的研究。而更为棘手的是，此间砚台上的铭文，多涉及多种书体，且砚台并非一次成型，后世多有对前世砚台进行改刻、重镌的行为，故而进行针对性鉴别恰当的砚台鉴定，需要鉴定者具有相当的古代书画鉴定知识储备。清代作为中国古砚发展的最后一个高潮，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加之书写习惯的变化，使得这一时期的砚台发展，无论是在材质上还是形制装饰上，都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又由于清代地域辽阔，各个地区的技术传统、生活习惯有所差异，也造成了砚的形制和装饰风格等具有诸多不同，因而无论是从空间地域来看，还是从时间维度来看，清代砚台这类器物，无论从精美程度还是质量高低上，各地域的差异性极大，难以用一个标准来进行简单区分。如若真正的“砚痴”想了解清砚的全貌，就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了解中国各个地区的砚台流行概况，做出有针对性的案例性研究。这是一件极其繁琐的浩大工程。故而《百砚千姿》这本书出版的贡献也在于此：它无疑为读者们了解北京地区的明清古砚，以及20世纪前半期北京地区古砚收藏市场的概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

《百砚千姿：古砚研究专辑》
编者：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6月

■ 编辑手记

博物馆学经典之作的理论导图

——《20世纪西方博物馆研究著作指南》推介

叶姿倩 胡雪琪

2025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聚焦全球化进程与技术革新交融之际，博物馆如何重新定义自身角色。如今，虽然置身于社会变迁的浪潮中，博物馆依然需要对自身的“来处”秉持更加坚定的认知。

博物馆学这门致力于研究博物馆各方面的“学科”，曾被视作一个主要立足于“存在”的行业。博物馆是什么？博物馆为什么而存在？博物馆学在发展进程中，围绕这两个核心问题，逐渐形成了主要的研究路径。我们如果想要厘清这样的研究路径，便更加需要系统地了解学科的学术思潮与发展轨迹，更加需要吸纳前人的理论贡献。

《20世纪西方博物馆研究著作指南》一书，正呼应着博物馆研究领域的这种需求。本书汇集35位国内文博领域青年学者，回望对20世纪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42部西方著作，以书评形式，介绍著作的诞生背景、叙事框架、基本内容、学术争论和后续影响等方面，勾勒和整理1960—1999年西方博物馆研究的学术遗产与思潮流变，描摹西方博物馆研究在20世纪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为国内博物馆学发展提供了进一步参考与有益补充。在2024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宣传展示活动中，本书荣获“2024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称号。

20世纪初期，博物馆学曾出现一次重要的“转向”，从构建自然世界知识，转为构建有关自身的知识基础与学科内容。这样的“转向”亟须博物馆学定位学科的全新“面向”：以博物馆现象、博物馆实践和博物馆制度为特定对象，以多学科理论为研究方法，对博物馆行为和博物馆表象进行研究，以此书写新的学术文本。

如果说20世纪初的“博物馆学转向”，将学



科的目光从展品转向了“博物馆本身”，那么如今博物馆领域的学者要完成的，则是另一重意义上的“转译”：将西方博物馆学的经典文本译译为可在中国语境中生根的话语，把这些作者的思考绘制成一幅共享的学术地图。本书呈现的四重“连通”——连通古今、连通中西、连通整体与细节、连通差异与共性，正是为了让人们在“转译”之后迅速找到可落脚的坐标——既听得见西方的理论声音，也得出本土的学术回响。

本书凝聚1960—1999这40年间的学术成果，基本覆盖了博物馆学在这一期间的主流议题，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这40年的学术成果涵盖了三代学者的研究，尽管他们立场各异，但他们的著作都常被列为博物馆学入门或进阶阅读的经典读本。本书纳入这些经典著作，连通其清晰的学术“来路”与当代读者理解博物馆学理论时的思想“去路”。

不同于节选著作或论文，本书对选编著作整体进行述评，书中收录的若干作品曾被海外大学课程列为指定教材，有些在学科史上被频繁引用，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通过系统的译介与述评，本书致力于为中文读者提供便捷的

查考渠道，译介的过程也并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通过译介、批判与反思，连通西方博物馆研究的学术成果与博物馆学学科在地化的基础建设。

每篇述评文章在呈现著作时，先以“全景”勾勒的方式，概述其核心内容与学术价值，让读者了解整体轮廓；再选取其中的关键段落进行“细节”解读，为读者深入研读提供切入点。此种述评方式连通整体与细节，既帮助读者快速把握著作主旨，又为其深入研究留下广阔空间。

本书汇聚了35位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文博领域学者，统一的术语规范和写作体例确保了述评文章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有效减少了因译名不一致或写作手法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使不同理论背景、语言的原著或译著文本，在中文语境中连为一体。此外，尽管原著著作各自有着独特的视角、立场、研究方法和写作目的，但他们在各自的语言环境和学术语境中，运用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术语、概念、理论和逻辑，共同阐述了他们对博物馆学的认知，以及对其本质的理解。

从20世纪的“学科转向”到21世纪的“话语转译”，博物馆学学科建设的目标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迭的过程中更加清晰，《20世纪西方博物馆研究著作指南》为我们描摹了西方博物馆研究学术探索的理论导图，更以“连通”的初衷，将国际理论转化为可供国内读者使用的“钥匙”，为中国博物馆和博物馆学的发展开启一扇全新的大门。

（作者单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世纪西方博物馆研究著作指南》
编者：尹凯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3月